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

申请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报告

姓 名： 马妍

资格证号： 71041125

专业名称： 企业经济学

拟定学位论文题目： 数字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效应

报告日期： 2022.01.12

一、选题依据

|  |
| --- |
| 1.目的及意义（800字以内）  数字金融是指传统的金融模式结合了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对传统金融的支付结算、理财、融资和众筹等业务进行升级的新兴行业，经过过去十几年的迅速发展，对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数字金融平台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会形成新的垄断，不仅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可能会增加金融风险，一旦数字金融发生风险事件将会影响到商业银行，会加剧商业银行的风险。商业银行是金融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是否健康发展事关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安全运行。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对数字金融和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数字机金融对商业银行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为商业银行防范风险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体现在：  （1）当前关于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的研究，多集中于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的业务体系的影响，部分关注到商业银行风险的研究也仅仅针对商业银行本身或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对数字金融或金融科技等外部因素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不仅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单个商业银行风险的溢出，也分析数字金融对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的溢出，本文的研究可以对数字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类的文献进行补充。  （2）在我国的金融系统中，银行业一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数字金融与银行间存在业务上的竞争与合作，在数字金融风险溢出效应中必然首当其冲。探究数字金融对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一方面可以为数字金融企业和商业银行进行科学合理的风险控制提供参考意见，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另一方面也能帮助投资者比较清楚的了解投资风险，让投资趋向透明化和合理化，营造一个健康的投资环境。 |

|  |
| --- |
| 1. 文献综述（3000字左右）   （1）数字金融相关研究  黄益平等（2018）认为数字金融本质上是依然是金融，但是传统的金融模式结合了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升级传统金融的支付结算、理财、融资和众筹等业务模式。中国人民银行将互联网金融定义为利用通信、互联网、信息等技术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能够更高效实现金融的投资、融资等作为信息中介服务的功能。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金融科技的定义为，主要利用技术方式让金融业务创新、升级，塑造新的商业模式、金融产品、技术与业务方式等，他们能够对现有的金融机构、服务和市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上述三个权威定义来看，数字金融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三者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但是某种程度上数字金融的概念更加普适与广泛化。  数字金融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证券分支机构等面对面服务的时间、空间限制，缩短了客户与金融机构间的时空距离，得益于通信技术的普及，通过手机客户端，比如网上银行APP等途径客户可以享受到更加快速便捷的服务，数字金融所具有的普惠特性也能大大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让曾经在传统金融体系下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人以更容易的方式和更低的成本享受到新兴的金融服务，提升了金融本质作用即对金融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并促进了行业整体的升级与创新（连耀山,2015；齐红倩等，2019）。吴国华等（2013）研究得出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风险控制有效性和极大拓展金融服务范围这三个机制作用于普惠金融，具体而言就是数字化的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维护成本和处理成本，大数据使金融服务更加个性化和精确化，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技术大范围应用于风控，提高了风险的甄别、预防和事后控制能力，新技术的使用同时降低了获客成本，实现供给端服务质量的提升，因此数字金融更具备普惠作用。  北京大学针对数字金融专门成立了数字金融中心，对数字金融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联合蚂蚁金服发布了多篇指数报告，编制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转型指数、互联网金融情绪指数等一系列与数字金融相关的定量数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相关研究  国外在金融风险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主要有：CoVaR条件在险值诞生在VaR在险值方法存在不足的基础上，由Adrian和Brunnermeier（2008）创新性地提出。VaR的含义指在一定概率水平下，在未来特定时期内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价值最大可能的损失，但它只能度量单个金融机构或市场发生的在险损失。某一金融机构或市场发生极端风险时对其他机构或市场造成的在险损失即风险溢出的衡量，则需依赖条件在险值CoVaR。该方法的提出，使得风险分析不仅仅只停留在单个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上，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溢出也可以通过数据得以表现出来，这是风险研究方面的一大进步。Roengoitya等（2010）选取了泰国六大商行的数据用于研究银行体系内的风险溢出。结果表明，一方面，单个银行机构对整个银行体系造成了风险溢出，且亚洲危机的发生与否并不能影响此类风险溢出的发生；另一方面，从贡献度来说，大型银行的风险贡献值较普通银行大，但规模也不是一个主导因素。CoVaR方法在实际应用后，学者们发现，虽然它有效地弥补了VaR在险值不能识别条件风险的不足，但也存在两个缺点：①CoVaR没有可加性，系统内所有单个机构条件在险值的累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个系统的条件在险值。采用于高频数据时，计算出的CoVaR易造成尾部损失的总体信息缺少十分严重，从而造成尾端风险测量不具有准确性。  在国内方面，即使CoVaR方法存在一些缺陷，也并不影响它成为国内学者运用的主流方法，少数学者运用其他一些方法，如MES、MVMQ—CAVia R模型等；研究结论上，我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水平整体偏高这一结论是多数学者研究的结果，只有极少数学者通过论证得出我国金融系统总体风险溢出水平不高的结论，但学者们在“我国金融业系统风险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这一结论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周阳（2019）着重研究了风险溢出在我国金融系统与各子行业之间的表现。结果表明，虽然各类金融子行业中都较为显著的会受到风险溢出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完全统一；且它的变动与风险水平的变化有关，证券业在风险加剧的市场条件下，成为了各子行业中风险溢出水平最高的。卜林、李政（2015）分析了我国部分上市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与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机构风险溢出值由大到小依次是商业性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因此，监管部门要将其监管力度适当地向商业性银行倾斜；而在时变特征这一方面，周期性较为明显，且各金融机构具有的高度协同性也就意味着相同的行业不同的业务之间将受到一定的风险传染的威胁。与前述几位学者不同，周亮、李红权（2019）在研究风险溢出的同时还探讨了它的非对称性。研究表明，风险溢出在我国金融系统中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在样本期内，呈负向风险溢出的金融机构占了绝大多数，与此同时，非对称性十分明显的存在，除银行业外，其余金融行业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但程度并不一致，此外，这种非对称性与股市变动并没有相关性。吴永钢、赵航（2019）等则从极端风险溢出的视角出发，但研究结果与周亮、李红权的存在差异。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溢出水平中等，并未达到高风险溢出的程度。此外，他们在非对称性的基础上，发现非对称性中还存在相依性，其中金融机构往往扮演着风险溢出者的角色，而金融市场则不可避免地充当着风险接受者。  （3）商业银行风险溢出相关研究  关于商业银行风险溢出的存在问题，国内外学者一般从传染的角度来进行主要剖析。Diamond&Dybving（1983）在研究中首次在理论方面论证了银行机构间的风险传导过程。随后，Schoenmaker（1996）通过数据统计指出，由于业务之间的交叉性，单个银行的风险极易传染给其他银行。实证方面，Ong&Čihák（2007）运用了极值理论进行模型推导，证明了银行间的风险传染效应显著存在。国内而言，董满章（2005）首先提出，鉴于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外部环境因素会导致风险传染的存在。包全永（2005）从银行系统的债权债务角度出发，发现了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确存在某种扩散效应。王瑞绮和郑冉（2010）在扩展区间事件分析的理论框架上，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传导机制，以实证手段证实了银行风险传染特性的存在。  对于影响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因素，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Hasman&Margarita（2008）基于信息溢出网络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他发现信息不对称效应是影响银行机构风险溢出效应强度的重要因素。López-Espinosa et al．（2012）以国际金融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为样本，证明了银行杠杆率和经营规模对银行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影响。Ladley（2013）认为在外部因素影响下，银行机构间的拆借行为会给风险溢出效应产生非对称影响。国内学者高国华和潘英丽（2011）基于动态GMM面板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的自身风险、不良贷款率以及宏观经济因素对风险溢出效应都具有重大影响。为研究宏观经济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李志辉和樊丽（2011）选取了若干宏观经济指标对银行股票日收益率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物价指数是影响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主要原因。类似的，周天芸等（2012）分别检验了大陆、香港两地银行机构的风险溢出效应对流动性、利差以及房地产指数等宏观指标的敏感度。  目前，国内外对于银行风险溢出效应测度的主流方法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  ①边际预期损失模型（MES）  Acerbi&Tasche（2002）对传统的期望损失（ES）进行拓展，率先提出了边际期望损失（MES）。Brownless&Engle（2011）利用公开市场信息，结合压力测试法对MES模型进行扩展，提出了SRI指数。Acharya et al.（2012）和Banulescu&Dumitrescu（2015）把金融机构的规模及负债因素纳入到边际预期损失的计算当中，创新地提出了CES模型。国内学者赵进文和韦文彬（2012）以我国各银行股价为样本数据，以MES模型为实证手段，测度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宋清华和姜玉东（2014）通过计算银行的边际预期损失，理论分析了可能对银行风险溢出效应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张晓玫和毛亚琪（2014）从我国银行机构的非利息收入入手，将LRMES模型与MES模型有机结合，验证了银行非利息收入和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相关性。  ②或有权益模型（CCA）  CCA模型是基于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所衍生出的一种测算风险的模型。Lehar（2005）以全球1000家大型银行机构为样本，率先运用CCA模型量化研究了样本银行间的风险溢出效应。Gray et al.（2006）则在Lehar（2005）的研究基础上，利用CCA模型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有效地衡量了银行的违约风险传染。此后，为改善此模型在测度金融机构风险溢出的局限性，Gray&Jobst（2010）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拓展出了系统或有权益模型（SCCA）。国内学者范小云等（2013）在CCA模型中引入有向无环图技术，证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的强弱会受关联度的影响。随后，巴曙松等（2013）在Gray&Jobst（2010）的研究基础上，详细介绍了SCCA模型的构建原理与步骤，并验证了该模型在我国的实用性。  ③条件在险价值模型（CoVaR）。  相较于MES模型和CCA模型，CoVaR模型不但能够有效衡量金融机构间的风险溢出效应，还能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确定提供有力参考。Adrian&Brunnermeier（2008）在传统在险价值（VaR）的基础上，拓展出了可以描述金融机构风险溢出效应的条件在险价值（CoVaR）。此后，Cao（2010）在利用分位数回归技术计算出商业银行条件在险价值的基础上，采用Shapley值的方法捕捉了单家银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负外部风险溢出效应。针对国内而言，肖璞等（2012）借鉴Adrian&Brunnermeier（2008），利用CoVaR模型测度出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欧阳资生和莫廷程（2017）对CoVaR模型的定义进行适当改进，运用改进后的CoVaR模型，以风险溢出效应为衡量依据，识别出了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  值得说明的是，基于分位数回归技术的CoVaR模型，通常仅能捕捉变量间的线性关系，而对于刻画金融变量间普遍存在的的尖峰厚尾特性以及非线性关系则显得力不从心。鉴于此，Girardi&Ergün（2013）对CoVaR模型的定义进行了改进，提出了多元GARCH-CoVaR模型，并用此模型测度了美国银行业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Karimalis&Nomikos（2017）以金融数据的时变性为切入点，将时变Copula函数有效引入Co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国内学者李志海等（2009）率先选用了AR-GARCH模型进行CoVaR的计算，且结果表明，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主要是五家国有银行。王周伟等（2014）分别采用分位数回归技术以及DCC-GARCH模型测度了我国银行机构与金融体系之间的CoVaR值，通过比较发现，DCC-GARCH-CoVaR模型的度量结果更为准确。随后，严伟祥等（2017）在传统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加入信托行业和期货行业，统一运用DCC-GARCH-CoVaR模型分析了金融体系内部子行业的动态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衡量了子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效应。  （4）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  危中有机，压力即动力，在数字金融给传统金融行业尤其是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群体带来巨大的挑战的同时，也倒逼了银行的变革与创新。北大数字金融课题组研究发现银行纷纷往金融科技方向进行转型，转型力度中小银行大于国有银行，并根据165家商行样本编制了银行互联网转型指数报告。刘澜飚等（2013）认为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更多是相互融合而非互相竞争与替代。沈悦等（2015）利用36家银行样本，依托技术溢出理论，研究认为互联网金融提高了商行的全要素生产率。  而对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商行的风险承担的影响方向学术界未有一致的结论，一部分研究认为面对数字金融的冲击，商行会主动选择高风险项目，从而提高了风险承担水平，另一部分研究则通过实证验证数字金融发展会降低商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比如，互联网理财严重影响了商行传统的存款渠道，吸储压力变大从而纷纷出台了“全员营销”政策，而根据Marcus（1984）提出的假说，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会因为吸储竞争而降低，因此银行会主动去承担风险从而获得高收益。戴国强等（2014）也认为数字金融的竞争影响了银行的负债端业务，银行为获得利润增加了贷款利率，让借款人更多选择高回报又伴随着高风险的产品，从而增加风险。刘忠璐（2016）通过自己构建的指数，通过实证方式研究证明互联网金融对银行整体风险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但是分开银行类型来看，互联网金融却对除股份制行外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均具有促进作用。  （5）文献述评  针对风险溢出效应，本文将风险溢出的研究对象共分为了三类进行文献搜集工作，分别是金融业、商业银行和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范围由大到小，层层递进。通过对比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在进行风险溢出的计算和分析时，CoVa R是一种主流方法，但是在计算时所使用的模型方法较为多样，比较常用的有GARCH类模型、分位数回归法和Copula函数，对于哪种方法最优目前还没有定论。这三类文献的研究数量呈递增趋势，即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的文献数量最多、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次之，而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文献数量最少，这与题目范围大小相一致。研究互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文章中，定性分析的较多，少量定量分析的文章均以数字金融指数代表金融业，从宏观上研究其对商业银行造成的风险溢出效应，从微观层面上研究的文献鲜少。  疫情期间，数字金融平台发挥自身的金融科技优势，对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地位进一步得到认可。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将迈上新的台阶，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将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对于平台经济的存在的问题，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随着数字金融领域监管体系的完善和监管思路的调整，原来学者的研究在数字经济时代未必适用，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效应，进而总结具体的政策及建议。 |

二、研究方案

|  |
| --- |
| 1.论证方法及数据来源  （1）论证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总结关于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现状、研究成果，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  定性分析法。预测人员通过以往积累的经验，运用自身判断和分析能力，对事务的性质和发展作出推断的分析方法叫做定性分析法。本文在研究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时，使用定性分析方法，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互联网金融是如何对商业银行产生风险溢出的。  定量分析法。针对社会现象的特征、关系和变化而采用的数量分析的方法就是定量分析法。本文在进行风险测度及风险溢出效应研究时，着重使用定量分析法，利用ARMA-GARCH类模型对各指数序列和收益率序列进行拟合后，计算出风险值VaR和条件风险值CoVaR、风险溢出值△CoVaR和风险溢出程度%CoVaR，将风险与风险溢出进行量化。  （2）数据来源  宏观方面，在数字金融指标的衡量上，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方式进行衡量。一是选择数字金融中的代表性行业第三方支付或者互联网理财，使用他们的总体规模来衡量数字金融的发展程度，这种方式只能说明该行业很小一部分的发展情况。二是自行建立百度关键词，利用文本挖掘的方式，构建数字金融指数，这种方式受选择的关键词的主观影响程度较大，而且只能反映数字金融在媒体上的热度，而非真实的产业发展情况。三是使用北大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邱晗等，2018；郭峰等，2019）。该指数通过蚂蚁金服的底层交易数据，支付宝是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平台，该数据能够充分反映中国数字金融在支付、信贷、理财、保险等多个行业上的使用深度、广度与数字化程度，很好地量化了国内数字金融的发展程度。从研究的科学性角度考虑，本文使用了第三种方式，并且具体使用了该系列指数中的“覆盖广度”来衡量数字金融的发展程度，原因为这个指标更多随着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而变化，而与银行业的行为关系不大，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研究的内生性问题。商业银行业部分则选取中证银行指数来代表整个行业，是近年来较具权威性的指数，数据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  微观方面，选取单个数字金融产品和部分商业银行，计算其风险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数字金融产品对商业银行的产生的风险溢出。数字金融产品方面，本文选取与支付宝挂钩的货币基金—天弘余额宝作为研究对象，天弘余额宝于2013年6月推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商业银行方面，目前我国共有6家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34家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虽然三类银行在数量上相差较大，地方性城商行数量最多，但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规模和市场份额最大，股份商业银行次之，地方性城商行则最低，且很多地方性城商行并未上市，故将三类银行的样本量均取4，由此共选取了12家商业银行，以探讨天弘余额宝对12家银行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这12家银行分别是工商、交通、农业、中国、招商、光大、中信、华夏、北京、上海、杭州和宁波银行。同时，本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的收益率数据作为状态变量。微观部分及上证综合指数的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 |
| 2.核心观点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分别测度与分析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两大主体风险值的基础上，研究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所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宏观上，使用北大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衡量数字金融行业，中证银行指数衡量商业银行业，利用两大指数先从总体上计算与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产生的风险溢出。微观上，数字金融方面，选取了国内最大的货币基金天弘余额宝；商业银行方面，则从国有控股商行、股份制商行、地方性城商行中分别选取4家，合计12家商业银行，研究单个数字金融产品对不同商业银行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本文基于最小AIC和BIC以及最大似然值原则，为选取的2组指数序列和13组收益率序列选择出最佳的ARMA-GARCH类模型，在拟合的基础上，计算出各自的风险值以及风险溢出值。在风险测度方面，通过计算风险值Va R将风险值量化，而在风险溢出方面则通过计算条件风险值CoVaR以及其派生指标风险溢出值△CoVaR和相对风险溢出程度%CoVaR，对风险溢出效应进行全面的分析。 |
| 1. 创新之处   （1）研究数据的创新  由于数字金融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成为热门主题，在对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上每位学者都有不同的方式，在已发表的文献中，作者多采用自主建立关键词库+文本挖掘法量化数字金融的发展指数，此种方法所得到的数据波动较大，难以真实地衡量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而本文采用北大发布的利用支付宝底层数据测度的指数，利用此数据能够更好地得到数字金融对银行业产生的真实影响。  （2）研究方法的创新。数字金融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产生了新型风险，大多数学者侧重于研究数字金融平台和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而关于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深入研究不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二者间风险溢出效应的较少。本文基于ARMA-GARCH类模型对数据拟合后，通过计算出风险值VaR、条件风险值CoVaR、风险溢出值△CoVaR和风险溢出强度％CoVaR，在分析和测度数字金融和商业银行金融风险基础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为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的风险及风险溢出效应的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持。  （3）研究内容的创新。在平台经济治理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背景下，对数字金融的监管不断加强，已有关于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多从整体上分析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市场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而较少关注到风险及作用的内在机制，本文创新性的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最大的数字货币基金余额宝和12家上市的商业银行，从微观层面研究单个数字金融产品对不同银行机构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 |

|  |
| --- |
| 4.参考文献  [1]Angeloni,L.,E.Faia and M.L.Duca,2012,Monetary Policy and Risk Taking,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2]Baden-Fuller,C.,and S.Haefliger,Business Model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Long Range Planning,2013,46(6),419-426.  [3]Barrell R,Davis E P,Karim D,et al.Bank Regulation,Property Prices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for Banking Crises in OECD Countrie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15,34(9):2255-2264.  [4]Borioc,Zhu.Capital Regulation,Risk-Taking and Monetary Policy:A Missing Link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J].BIS Working Paper,2018(268).  [5]Buchak,G.G.Matvos,T.Piskorski,and A.Seru.Fintech,Regulatory Arbitrage,and the Rise of Shadow Bank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8,130(3):453-483.  [6]Francis W.B.,Osborne M.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ank Behavior in the UK:Are There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Capital Standard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2,36(3):803-16.  [7]Fuster,A.,M.Plosser,P.Schnabl,and J.Vickery.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Mortgage Lending[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9,32(5):1854-1899.  [8]Goldstein,I.,W.Jiang,and G.A.Karolyi.To Fin Tech and Beyond[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9,32(5):1647-1661.  [9]Herring R J,Vankudre P.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Taking By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7,42(3):583-599.  [10]Huang,Y.,C.Lin,Z.Sheng,and L.Wei.Fin Tech Credit and Service Quality[R].Working Paper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8.  [11]Kai D.,Nicholas S.,Mergers,Acquisitions,and Bank Efficiency:Cross-Country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s[J].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2016(36).  [12]Kapoor,A.,2013,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dian Economy[J],Futures,10,35-42.  [13]King,R.G.,and R.Levine,Finance,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5,32(3),513-542.  [14]Laeven L.,Levine R.Bank Governance,Regulation and Risk Tak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9,93(2):259-75.  [15]Levine,R.E.,2015,Finance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1,865-934.  [16]Lin,C.,P.Lin,F.Song,and C.Li.Managerial Incentives,CEO Characteristic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8,39(2):176-190.  [17]Marcus A J.Deregulation and bank financial policy[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14,8(4):557-565.  [18]Navaretti G B,Calzolari G,Mansilla-Fernandez J M,et al.Fintech and Banking.Friends or Foes?[J].Friends or Foes,2018.  [19]Pathan S.Strong Boards,CEO Power and Bank Risk-taking[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9,33(7):1340-50.  [20]Ragjam,R.G.,and L.Zingales,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88(3),559-586.  [21]Roman M.,Nickolaos G.Tzeremes.CEO Compensation and Bank Efficiency:An Application of Conditional Nonparametric Frontier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16(251).  [22]Saxenian A,Hsu,J.,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 Connection: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J].Access&Download Statistics,Vol.10,NO.1,2017,Pp.893-920.  [23]Wang Z,Chen J,Wan Y,et al.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Bank Risk‐Taking under a Partially Implicit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Evidence from China[J].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2015,48(2):163-176.  [24]Zeng M,Reinartz W.Beyond online search:The Road to Profitability[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13,45(2):107-130.  [25]Zhu,C.Big Data as a Governance Mechanism[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32(5):2021-2061.  [26]陈彩虹.多维视角看金融科技问题[J].中国银行业，2019(03)：42-45.  [27]黄益平，黄卓.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季刊)，2018，17(04)：1489-1502.  [28]黄益平，陶坤玉.中国的数字金融革命:发展、影响与监管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2019(06)：24-35+5.  [29]连耀山.互联网环境下普惠金融发展研究——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融实践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36(03)：86-90+148.  [30]廉薇，边慧,苏向辉等.蚂蚁金服: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J].华东科技，2017(09)：80.  [31]刘澜飚，沈鑫，郭步超.互联网金融发展及其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影响探讨[J].经济学动态，2013(08)：73-83.  [32]莫易娴，曾祥菁.互联网金融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冲击与对策——以余额宝为例[J].新金融，2014(06)：44-48.  [33]宋首文，代芊，柴若琪.互联网+银行:我国传统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新变革[J].财经科学，2015(07)：10-18.  [34]孙杰,贺晨.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及传统银行转型[J].财经科学,2015(01):11-16.  [35]周阳.我国金融业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J].商业现代化,2019（03）:1-2.  [36]卜林,李政.我国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研究[J],当代财经.2015(06):5-7.  [37]姬新龙.随机波动、极值理论与金融风险测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40-45.  [38]邓小峰.金融行业收益与风险溢出效应研究[J].当代经济,2019(02):3-4.  [39]周亮,李红权.金融业系统风险溢出的非对称性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社会科学版）,2019,34(6):10-13.  [40]吴永钢,赵航,卜林.中国金融体系内极端风险溢出关系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9(05):23-24.  [41]王蓉.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双向溢出效应及其CoVaR模型估计[J].统计与决策,2016(2):2-3.  [42]陈健,王鑫.商业银行风险溢出的网络关联效应研究[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34(4):10-11.  [43]叶莉,李园丰,王远哲.基于CoVaR方法的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测度[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9,48(5):7-8.  [44]韩超,周兵.基于时变Copula-CoVaR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44(8):5-6.  [45]李治章,王帅.互联网金融对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的测度[J].经济研究导刊,2018(36):2-3.  [46]翁志超,颜美玲.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9(22):2-4.  [47]张保帅,段俊,田盈.基于 Copula-GH-CoVaR 模型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6):9-11.  [48]胡宗义,刘砚伊.基于金融压力指数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测度及影响因素[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38(04):13-16.  [49]谢福座.基于GARCH-Copula-CoVaR模型的风险溢出测度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20(12):12-16.  [50]王玉婷,马慧子,王向荣.互联网货币基金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03):9-10.  [51]赵红,姬健飞.余额宝收益率对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的影响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38(3):65-71.  [52]陈珂,张竞文.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与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GARCH-CoVaR模型[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7(9):41-46.  [53]高国华,潘英丽.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基于动态CoVaR方法的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1,45(12):1753-1759.  [54]刘超,徐君慧,周文文.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溢出指数和复杂网络方法[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7,37(4):3-5.  [55]战文清,刘尧成.数字金融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分析[J].浙江金融,2021(12):35-47.  [56]汪伟,郑颖,阮超.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转型研究进展[J].金融科技时代,2021,29(11):42-45.  [57]赵素敏.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思考[J].商业文化,2021(25):110-111.  [58]余静文,吴滨阳.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J].产经评论,2021,12(04):108-128.  [59]马菲菲.数字金融背景下提升银行风险防控的措施[J].商业观察,2021(18):58-60.  [60]粟麟,杨伟明.数字金融：发展现状、未来趋势与监管启示[J].北方金融,2021(06):8-12. |

|  |
| --- |
| 5.论文提纲  题 目：数字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效应  主题词：数字金融；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2研究内容和方法  1.3创新点   1. 文献综述   2.1数字金融概述  2.2数字金融的发展效应  2.2.1数字金融对创业行为的影响  2.2.2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2.3数字金融对企业的影响  2.3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2.4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1.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3.1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渠道分析  3.1.1通过资金清算渠道发生风险溢出效应  3.1.2通过同质经营渠道发生风险溢出效应  3.1.3通过同业拆借渠道发生风险溢出效应  3.2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理论研究  3.2.1风险溢出理论  3.2.2信息不对称理论  3.2.3金融脆弱性理论  第4章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4.1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测度方法  4.1.2 GARCH-Copula-CoVaR模型  4.1.3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测度步骤  4.2数据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4.3模型构建  4.4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定性分析  4.5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宏观实证分析  . 4.6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微观实证分析  第5章 结论和建议  5.1结论  5.2建议  5.3不足和展望 |